



第 24 辑

中国人类学评论

Chinese Review of Anthropology

—— 王建民 潘蛟 赵旭东 主编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文 津 出 版 社

中国人类学评论

第24辑

王建民 潘蛟 赵旭东 主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文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类学评论. 第24辑 / 王建民, 潘蛟, 赵旭东
主编. — 北京: 文津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 - 7 - 80554 - 589 - 9

I. ①中… II. ①王… ②潘… ③赵… III. ①人类学
— 文集 IV. ①Q9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1678 号

中国人类学评论 第24辑

ZHONGGUO RENLEIXUE PINGLUN DI - 24 JI

王建民 潘蛟 赵旭东 主编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文津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3.5 印张 265 千字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554 - 589 - 9

定价: 4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学术编辑委员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建民 (中央民族大学)

庄孔韶 (浙江大学)

杨圣敏 (中央民族大学)

张江华 (上海大学)

张 珣 (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邵 京 (南京大学)

纳日碧力戈 (复旦大学)

范 可 (南京大学)

罗红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周大鸣 (中山大学)

周永明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赵旭东 (中国人民大学)

彭文斌 (重庆大学)

景 军 (清华大学)

潘 蛟 (中央民族大学)

潘天舒 (复旦大学)

本期主编助理

唐莉霞 田夏萌 宋 潇 刘殊曼 周 莹

本书由

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之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资助出版
系该中心课题成果

目 录

学术论文	(1)
欧洲与中国的角色认同、道德经济体与文化分形	(1)
台湾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	(11)
阿里山邹族的旧文化与新传统	(23)
聚合流视角下的个体认同	(42)
村庙修建与村际关系的建构：冀南广宗县白刘庄、夏家庄口述史研究	(47)
社区参与旅游与族群文化保护：类型与逻辑关联	(59)
社区组织在遗产保护社会化中的作用：以厦门龙源宫的文物化过程为例	(72)
人类学工作坊	(83)
神圣与世俗：19 世纪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两种话语	(83)
空间、文本与话语：博物馆是什么？	(94)
游走在神圣与世俗之间：博物馆人类学视域中的观众	(108)
学术讲座与学术讨论	(117)
神韵与美德：文化边界与国家边界的和而不同之道	(117)
大传统与它的食品：关于文化遗产的若干感想	(142)
学者对谈	(165)
文化多样性与现代性	(166)
全球化背景下的治理与参与	(178)

中国人类学学术访谈..... (191)

 周永明..... (191)

学术信息..... (203)

 近期台湾人类学界主要学术活动信息 (2012 年 8 月—2014 年 3 月) (203)

学术论文

欧洲与中国的角色认同、道德经济体与文化分形

劳伦斯·罗兰·博格 (Roulleau - Berger) ①

高美慧/译 吴乔/校 ②

角色认同的建构在欧洲和中国的背景中是一个复杂的议题。更重要的是，现在有两个不同的自我需要加以区分：叙事自我，意为生平故事中的自我；反身性自我，是指赋予意义的方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叙事自我和反身性自我并不以相同的方式被建构。这两个不同的自我不能与不同社会背景中实现生命政治和自我管理方式相分离。整个议题因此变成了个体——特别是最弱势的个体——是如何组织生平经历的。在民主与非民主社会，个体得以获取自我管理机会的弹性空间被当地社会所形塑。尽管如此，随着新世界主义的到来，地方层面的个体自我在全球层面上的多维性也有所增长，这是国际交流造成的。

一、在法国和中国社会中思考角色认同

在西方的理论中，主体我和客体我被视为非连续性自我过程的分离的片段，而在中国式思维中，这两者并未清晰地被描绘为分离的步骤，而自我过程是更具备连续性的。

被欧洲人采纳的美国互动论中，每个个体拥有多少种社会自我，取决于他人有多少种认识和创造该个体形象的方式。角色认同以及角色化的概念通过角色重组、

① 劳伦斯·罗兰·博格，法国第三高等师范（里昂）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② 高美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吴乔，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角色冲突^①以及角色转换^②的概念而广为流传。在戈夫曼的理论^③中，他追随米德^④的脚步关注角色差异。这种差异既包括社会现实中的社会和个人身份，也包括角色认同，也就是个体在多种多样的社会体验中获得的对于自身位置的主观感受。在法国的研究者当中，保罗·瑞克的工作关注叙事身份已经存在并继续存在对于定义的重要影响，这种定义使得多元主体共存于生平故事中，“主体通过不断用真实和虚构的故事重新塑造生平故事来讲述自我”。波拉克对于不可言说身份以及受伤性身份的研究对于从一个动态和可逆的视角反思自我做出了重要贡献。最后，近些年，德国社会学家奥克斯·霍耐特^⑤回溯了“自我”这个话题，他重新定义了“自尊”概念——三种形式的认知的产物：爱的主体间性经验、个体权益的合法性认知和以社会声望考量的社会尊重，因此他在欧洲社会学领域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在中国社会学界，“自我”概念无法脱离“我们”。在法国社会学界，“自我”首先立足于个体化过程中，然后才与“我们”发现关联。主体性的概念较少在中国社会学界被提及，但他人的主体性并未被忽略。关系问题是整个中国社会学领域的基础，自我概念是在互动论和实用主义传统中被处理的。例如，杨宜音^⑥假设“双重我们”来自互动秩序的建构。杨宜音解释怎样去定义人际关系，我们需要将家长制的传统以及关系中的信任和交互责任考虑在内。一方面，我们是被某种关系所生产的，这些关系为自我划定了具体的边界（或者，更精确地说，这就是费孝通所谓的差序格局）；在另一方面，我们是被社会分类、角色认同和身份归属所生产的。可以这样说，他人取向的自我认同和角色认同建立在“双重自我”的基础上，然而，在西方，角色认同首先建立在自我以及客体我的基础上，在自我建立的过程中添砖加瓦而成。

最后，在中国社会学中，叙事自我的地位要高于反身性自我，然而在法国社会学理论中，反身性自我的地位要高于叙事自我。因此，我们可以讨论中国社会学与法国社会学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即使其历史与哲学传统不同，叙事自我和反身性自我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特别是不同历史和政治轨迹中，以不同的方式被构想、经历、再现和安排。

① Strauss A. . Mirrors and Masks; The Search of Identity [M]. Glencoe: Free Press, 1959.

② Berger P. , Luckmann T. . La construction sociale de la réalité [M]. Paris: Méridiens Klincksieck, 1986.

③ Goffman E. . Stigmates [M]. Paris: Minuit, 1975.

④ Mead G. H. .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⑤ Honneth A. . La lutte pour la reconnaissance [M]. Paris: Editions du Cerf, 2000.

⑥ 杨宜音. 自我及其边界：文化价值取向角度的研究进展 [J]. 国外社会科学, 1998 (06): 24 - 28.
Yang Yiyin. Relation et identité. Approche du processus psycho-social de la formation du « nous » chez les Chinois [A]. L. Roulleau-Berger et Guo Yuhua, Li Peilin, Liu Shiding, dir. La nouvelle sociologie chinoise [C]. Paris: Editions du CNRS, 2008.

二、生命政治机构与自我管理

在欧洲的民主国家中，个体化成为公共政策的新口号，地方公平的框架中成为自身作为一种强制要求也与此一致。当个体处于不稳定的情景中，例如失业、避难和移民，就被划分到合法性较弱的空间之中。为了使社会权利得到认可，例如就业权与居住权，个体需要向国家及其代理人进行自我展示，用他们生活的细节去唤起情感，有时，他们甚至需要展示身体。这个过程意味着让最脆弱也更容易受伤的人们去参与主流的竞争，并在竞争中维持自身。^① 现在，在西欧的社会中，表达并成就自我的强制要求意味着讲述生平故事，并在雇佣市场和有关雇佣权、居住权和社会保障这样的公共政策执行框架中将其作为规范。生命政治结构被建立起来并试图控制个体创造叙事性角色认同的意图和行动，使其符合制度规范。^② 正如迪德·凡逊^③指出的那样，强制要求包含成为自身以及服从国家的双重指令造成了“主体认同和主体化的双重过程”。

欧洲与中国的道义秩序背景在自我管理的过程中生产出了非常明显的社会不平等，这个过程体现在并与具体的政治、历史、文化轨迹相联系。全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产生了建立在道义秩序与对身体与自我的主动约束与被动驯化的机构中的一些管理方式。生命政治机构被充斥着建立在制度结构与自我管理不同形式的基础之上怀疑、鄙视、假慈悲、热情的道义秩序所塑造。道义秩序中的怀疑来自他人的歧视、污名化和否定性的认知，是否有可能动摇公众的这种规定也同样值得怀疑。道义秩序中的鄙视来自他人施加的否定、道德和心理暴力以及否定性认同的社会道德力量。道义秩序中的假慈悲来自公众淡漠的关心以及虚假认同，以欧洲为例，道德意图实为社会统治或者国际殖民主义的形式。道德经济体中的热情促使公众和市民采取行动来变革、同意、考虑以及充分认识无权益人口或失业者或社会地位低下人口的社会、道德、经济和公民权。

在这两种情况下，公众行动者创造道义秩序并把不同的人口划分到不同的社会空间中。欧洲的民主政治以制度多元化、声明政治机构多样化为特色。例如，在法国，失业人口、幼年无经济来源者、移民和难民被整合到社会结构或联合会之中。在中国，生命政治结构直接关系到农民工、失业人口、失地人口和艾滋病

① Thireau, Hua Linshan. *Les ruses de la démocratie: Protester en Chine* [M]. Paris: Seuil, 2010.

② Fassin D., Memmi D.. *Le gouvernement des corps* [M].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3.

③ Fassin D., Bourdelais, eds., *Les Constructions de l'intolérable: Études d'anthropologie et d'histoire sur les frontières de l'espace moral* [M].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5.

感染者。这些人员的声音可以传达到上访办公室中，市民遭受的苦难及不公可以被公众所见。^①而在欧洲却没有同样的机构。中国人可以在政府联合的框架内得到关注。^②在灾后重建中，主要是道德经济体推进了护理工作。在危急关头，存在多样化的方式关爱他人。^③

成为主体的诉求作为生命政治的一条准则出现在欧洲和中国社会中。在中国和西欧，治理主体和主体性成为道德经济体的奠基石。于是，主体性已经被驯服，并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上被工具化。不同社会群体尽力争取被他人所控的道德自治。个体需要表现出自主性，在不同社会情境中行动并进行反身性思考。这些情景往往以某种方式为自治主体以及被驯化的个体自我修复自尊。这些往往归因于，这些情景允许个体之间在体制内出现竞争，道德经济体赋予其合法性。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个体越发需要证实自己的自主性以及事业心。例如，成为自己的命令清晰地成为一种规范是与具备就业资格的年轻人工作条件恶化相关的。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们一旦毕业，就被看作是社会精英，他们将在国企和公共机构中拥有稳定的工作。但今非昔比。我们可以看看拥有个人发展能力和自我实现的企业家形象是如何成为社会主义新英雄的。^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变得日益残酷，而不平等持续扩大，社会不再支持自治与弹性指令，而强令服从。道德界限强制地为自治主体划定边界。

生命政治机构发出成为自我的强令，造成了双重约束的困境以及自我认同与对他人的认同之间的碎片化和分化，乃至丧失自我。尽管如此，根据其属性，道德经济体将在双重约束加剧和群体、个人寻求自我的情境中发挥作用。秩序中的怀疑和鄙视将产生高强度的双重约束情景以及自我的严重缺失。群体和个人被塑造得日益软弱，感受到并认识到他们无法得到承认，无法得到一个受到社会关注的空间。社会秩序中的热情与宽容将促进自我认同与对他人认同之间的和谐。

① Fukui H. , Sugiman, T. .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for nurturing safety culture in a nuclear power plant [A]. Hollnagel E. ed. . Safer Complex Industrial Environments; A Human Factors [C]. 2010, 171 - 187.

② 罗红光，等。16位志愿者的180天[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③ [1] Abdullah I. . The structure and culture of disaster: Theory, research, and policy [A]. Procee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Disaster: Theory, Research, and Policy [C]. Yogyakarta: Gadjah Mada University, 2009.

[2] Fukui, H. , Sugiman, T. .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for nurturing safety culture in a nuclear power plant [A]. Hollnagel, E. ed. . Safer Complex Industrial Environments; A Human Factors [C]. 2010, 171 - 187.

④ Guiheux G. . Chinese Socialist Heroes: From Workers to Entrepreneurs [A] . Eric Florence , Pierre Defraigne eds. . Towards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in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 Economy, Society and Politics [C]. London: Routledge, 2012, 115 - 126.

欧洲民主制中的生命政治机构建立的道德经济体建立在自我管理的基础上,既包含了叙事自我,也包含了反身性自我;而中国的道德经济体更提倡叙事自我在自我管理中的作用,而非反身性自我。

三、痛苦的生平经历与个体化机制

由经济与政治制度制造的道德经济体使得个体化机制产生了不同类型的个人职业生涯。这使得道德经济体的形势中所需的客观职业与主观职业选择、制度章程相联系。^①

在当今的欧洲与中国社会,具备低水平的专业水准,以及拥有较少经济、社会与象征资本的个人与群体的社会地位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职业流动带来的地域流动和经济状况变化造成了个人社会空间位置的变化,个人生平经历也出现转折,弱势个体的客观的职业生涯由此不断受到干扰。人生传记中的这些转折点,如果它们增加了与社会建立联系的方式的话,就会被视作积极;如果它们加剧了社会分化的程度时,则将被视作具有分裂性。在每一个转折点上,地域和事件将对个体资源造成影响,这将重新分配与重组个体的社会地位、所在地和社会认同。生平转折点表现了道德经济体中的客观职业生涯的断续性,这与经济制度与生命政治机构也有关系。这样同样表现了“叙事自我”与“反身性自我”建构过程的断续性。如果“叙事自我”是支离破碎的,个人的反思性自我则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通过经历严峻考验并重组自身。

建立在重组不同种类资源的不同方式之上的道德能力,^②可以控制变化情景的可预测程度;是帮助支离破碎的叙事变得流畅的方法;创造条件获得“叙事和反思性自我”。尽管,仍然会存在饱和临界值,超出此,个体将失去反思能力。一再出现激烈的不胜任感和羞辱将使个体对自我产生不可逆转的羞辱感。不可逆性越强烈,道德能力的改变也越明显,叙事障碍也越大。不断增长的叙事和反思性自我碎片化造成了情景控制出现了更多的冲突、脱节、反观性的丧失、叙事性的支离破碎、自我的改变。当自我认同出现模式重塑、再调整与冲突时,“弱势的”个体在调整不同自我和维护自尊中体验到更多的困难。根据在不同社会空间中扮演的角色,个体时而受到社会尊重,时而受到轻视,他们在自尊自重与自轻

① [1] Hughes E. C. ed.. On Work, Race,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2] Hughes E. C.. Textes rassemblés et présentés par J. M. CHAPOULIE, Le regard sociologique [C]. E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1996.

② Sen A.. Repenser l'inégalité [M]. Paris: Seuil, 2000.

自鄙中徘徊。道德经济体中的怀疑和鄙视无助于重建和修复具有连续性的反身性和叙事自我，这与道德经济体的宽容和热情不同。

但是，叙事性这个主题迫使我们在中法不同的构造语境中去“定位”自我。欧洲的主体与中国的自我在获得文化的自我以及在痛苦的社会经历中维持自尊之中所经历的越来越大不相同。文化的自我以及对自我的关注在中法社会之中都是重要的智力议题。获得文化的自我这个议题很早就出现在人文学科当中。它出现在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作品中，中国汉朝时也出现了这个议题。在毛泽东时代，这个议题被隐匿，个体不得不压抑他们对文化的自我的渴求。在中国，对于自我的关注表现在文化自我的概念中，与儒家传统相联系，一方面，它无法脱离社会主义传承，另一方面，在儒家和道家学说中，个体被设定为可以通过专心致志和精神维度的方式来全面自控其内在世界并且将社会规范和价值内化，从而改变世界。在罗曼·格拉茨尼^①看来，文化的自我由自我组合、精神与身体面貌构成，这产生了对于道德的领会、认知的增长并伴随一生。福柯以柏拉图作为起点来回应了文化的自我这个主题，来谈论自我的艺术、自我的实践、自我的技术。相对西方个体本体论方法而言，这种文化的自我并不真正具备任何特异性与独特性。例如，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兴起传统，描绘了一个包含着5种自我精神的内在进程：人性、正义、活泼的精神、仪式与智慧、身心和谐。^②与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以及斯多葛派不同，在中国，文化的自我的建构不包含任何逻辑的话语，以及对普遍真理的争论或探究。

四、经济体弹性与自我管理技术

在这两种背景中，道德界限的划定是不同的，这给个体的生平经历造成了不同的转折点、可逆性和不确定性。对个人施加的道德限制越多，其生活就越被强制性选择、可逆性与不确定性所形塑。无论在中国还是法国社会，划定道德界限都是应对新的社会冲突的一种方式，这些冲突在道德界限上随时可能发生。道德界限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联合或冲突的焦点所在。在个体层面上，限制和转折意味着自我的损失；更具随机性的转折点需要流动性的增加，以此来激发认识的不确定性和可逆性。不同的道德界限已出现交叉点，也出现了争取道德自我管理的

① Graziani R. . The Sovereign and the Subject: Exploring the Self in Early Chinese Self-Cultivation [A]. J. Lagerwey, M. Kalinowski eds. . Early Chinese Religion [C].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Publishers, 2009.

② Graziani R. . The Sovereign and the Subject: Exploring the Self in Early Chinese Self-Cultivation [A]. J. Lagerwey, M. Kalinowski eds. . Early Chinese Religion [C].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Publishers, 2009.

社会冲突和竞争的场所。在当今的欧洲与中国社会,社会转折产生了清晰可见的新的道德界限,这也就意味着更多的安排、隔离与污名化。

在中国和欧洲,失业工人、身份模糊的工人以及移民工人中的个体往往被分配到低合法性与低社会化的社会空间中,因此就面临着高度的前途未卜性与高度的社会不安全性,因而举起了“弱者的武器”^①来发展自我管理技术,发展策略,在全球和地方经济体抗争和求生存。这个个人与群体发展策略和技术重组自身认同,以逃避外界对于自我的支配。他们在间质性、充满缝隙和破碎的空间中促进道德经济体恢复弹性。这些人的职业生涯建立在几乎不可控的转折点上,但道德经济体的复苏使这些个体重新建立自我认知,并成为自我的新主人。

在中国和欧洲,个体在获得叙事自我和反身性自我的过程中都体验到痛苦的生平经历,特别是那些经历曲折的越来越脆弱的人群,这时重新征服自我的这个话题又被抛出来。当我们面对弱势社会群体时,这个议题就被尖锐地提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强与弱的关系是社会、经济、象征支配中最首要的关系。尽管如此,我们也发现每个群体都有相对自主权,即便是弱势群体也可以让较强群体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们可以通过操纵关系来冲突、抗争或疏远,也可以通过关系来谈判和交换。^②当个体拥有自主权,特别是那些最不具备职业资格的个体,行动不再被他人控制,更重要的是发展了行动能力并可以改变已经建立的规范命令。尽管如此,这种自主和能力并不坚固,将不断地被情景、及时性和社会语境重新定义。因此,这时又出现了道德界限的再定义问题。

但是,个体如何发展自我管理的技术来划定道德界限?在当今的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沟通空间将年轻失业人口、农民工、社会活动家等聚集在一起,生产生存策略,共建艺术、文化和经济的微观组织。其他沟通空间则体现为 NGO 组织和机构协商机制,这也是社会空间的重组。在 2008 年大地震之后,四川省出现了一些宗教性的空间。^③可见,自然灾害后的社会修复以及再造不仅包含物质层面,也包含道德层面,包括精神信仰。

因此,被支配和控制的个人,也就是最弱势的,利用分散性的创造力和不对

① [1] Scott J. C..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 郭于华,孙立平. 诉苦:一种农民国家关系形成的中介机制 [A]. 罗沛霖,杨善华. 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 [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② [1] Roulleau-Berger L.. *Le travail en friche: Les mondes de la petite production urbaine* [A]. La Tour D'aigues, Editions de l'Aube, 1999.

[2] Payet J. P., Giuliani F., Laforque D.. *La voix des acteurs faibles*, Rennes: PUR, 2008.

③ 刘正爱. 祭祀与民间文化的传承——辽宁宽甸“烧香” [A]. 金泽,陈进国. 宗教人类学第一辑 [C].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9. 170-96.

称的策略来对抗最强势的。他们搜集物质、社会和象征资源来构建社会、经济与政治微观组织，通过创造共享规范来获取社会公众认同。不同群体都在为个体争取反思性能力和公共空间，使得这些群体有能力将个体能力转化为社会能力，^①在弹性空间中，个体得以为道德、经济社会认可而奋斗，也正是在这里，个人和群体得以改变为疏远的现状，重新回到经济、社会和政治民主空间。弹性空间为活跃的少数群体以及在以前只能隐匿身份的人群赋权，他们可以要求自我管理权、发展社会化与社会性能力，这将使他们能够重新征服、重新认识自身的主体性。

五、文化分形与多重定位自我

个体在多分布空间、及时性以及地方场景和全球化层次中发展自我管理的艺术。因此，在谈论文化时存在日益增长的困难性，阿帕杜莱^②指出存在重叠的文化分形和叠生的文化形式。新世界主义取向的研究需要进行跨国的文化变化过程的分析，这种过程包含着个体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当移民迁移到新的地区，会重构他们的历史，并在这个场景中重塑自我。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生平传记变得日益世界化和复杂，形成了多重的自我认同，不仅建立在不同情境中，也建立在多重定位的时空中。这种现象在跨国移民潮中特别明显。贝克（Ulrich Beck）写道“世界主义的生平传记”表现了全球化进程是如何改变生平传记的建构方式的。个体发展道路被移民过程中的一系列转折点重新划定；在每一个转折点都可以看到时空事件的重新安排（战争、失业等）；个人运用不同种类的资源去重置阶级、场所与社会身份。社会资本影响了个人所形塑和设置的资源种类。急剧的转折点需要强大的行动力去处理认同震撼和模糊。在迁移过程的每一步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个体在与他人的互动协商中重新定义自己的文化、专业和社会身份，也可以观察到个体赋予他们是谁，他们在做什么的意义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一夫多妻的生平传记是建构在社会经济不平等基础之上的，但移民们必须学会接纳文化差异和道德能力以适应多数社会的主流规则，并从中找到自身。自我在不同的尺度、空间和及时性中被多重定位。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移民潮是全球文化形态变迁的标志物，中国移民在新的

① Ricoeur P. . *Parcours de la reconnaissance* [M]. Paris: Stock, 2004.

② Appadurai A. .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文化联合体中积极进行创新与增长,并在不稳定的制度安排中创造“新的链接,这既非完全民族的也非完全全球化的”^①。新的世界主义产生了多重定位的自我,多样化的背景、空间和及时性产生了不同文化形式的组合、纠结以及联合,这些都重新定义并改变了自我。尽管如此,首先,经历跨国流动的叙事自我由于移民经历的性质和多样性变得更加国际化;这也意味着,生命旅程被围绕着频繁出现急剧的生平转折点的多样化的经历所打断。反思性自我变得更强还是更弱主要取决于与家庭成员联系的强弱以及原初社区和移民社区,取决于情感关系结构中的优势与劣势。^②例如,获取家庭支持的年轻的中国移民无论在世界的哪个位置,都与原属社会保持紧密的联系,发展经济成功的职业生涯建立在他们反思性自我的积极体验之上,倘若在跨国之路上失去与原归属地的紧密联系,反思性自我存在消极体验,他们可能会成为“流浪汉”。^③

文化分形与新世界主义创造了国际化的个体化形式(罗兰·博格),但这个进程具有多张面孔。当个体在跨国的弱合法性空间中损失了他们的物质、社会、经济、道德利益,由于进入了较少价值的场所,他们的社会关系资本不可避免地缩水,自我与关系变得支离破碎,情感结构削弱,我们就将这种情况称为下降的全球个体化。当个体在强合法性的跨国空间中其物质、社会、经济、道德利益有所增长,他们得到了更具价值的场所,社会关系资本得到增加,个体得到加强,关系得到维护,情感结构也得到加强,我们就将这种情况称为上升的全球个体化。

六、结论

我们这个话题是讲述一种理论视角,我们拒绝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学术霸权基础上的等级制。不是思考知识的多种分化,而是要建立欧洲与中国社会学之间的连续性,只有这样跨国知识才能得以出现,才能摆脱一切形式的东方主义。社会学的发展过程带有科学殖民主义的不同印记,东方主义^④是指社会体制绑架和

① Sassen S. . Territory, Authority Rights: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 [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Bastide L. . Ethnographie de l'ailleurs et ailleurs ethnographiques: postcolonialité, subjectivation et construction des espaces de l'enquête en Asie du Sud-Est [A]. L. Roulleau-Berger dir. Sociologies et cosmopolitisme méthodologique [C]. Toulouse: PUM, 2012.

③ Anderson N. , postface de Schwartz O. , Le Hobo. Sociologie du sans-abri [M]. Paris: Nathan, 1993.

④ Said E. . Orientalism [M]. London: Penguin, 1977.

诱拐科学知识。查克拉巴蒂^①提出“欧洲地方化”以及“贱民研究”之后^②，后殖民主义研究集中于扩展叙述范式的广度。尽管如此，最紧迫的任务仍然是探究一种方式，在世界上不同地方的知识的连续与断续，连接与断裂之中，为后西方社会带来光亮，使它变得既是全球的又是地方性的。^③

① Chakrabarty D. .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Bhabha H. . Les lieux de la culture, Une théorie postcoloniale [M]. Paris: Payot, 2007.

③ [1] Roulleau-Berger L. . Dewesternization of sociology: Europe in the mirror of China [A]. La Tour D'aigues [M]. Paris: Editions de l'Aube; 2011.

[2] Roulleau-Berger L. , Li Peilin eds. . European and Chinese Sociologie; A New dialogue [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Publishers, 2011.